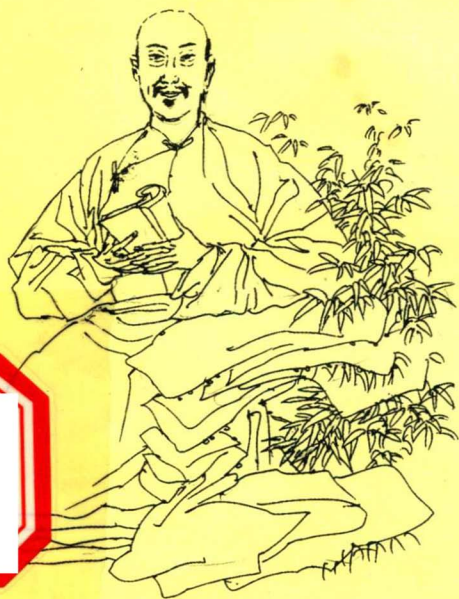




山西历史文化丛书(第二十一辑)

总主编 / 李小明



张穆与《蒙古游牧记》

郭丽萍
著

张穆，清代著名西北史地学家、诗人、书法家。身处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的转折年代，他的思想、学术承上启下，继往开来，他敏锐地洞悉变局的来临，积极反思王朝盛衰之缘由，是道光朝讲求经世致用的代表人物。《蒙古游牧记》是张穆学术生涯的顶峰之作。

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

责任编辑:刘冬梅

张 熔

复 审:余超英

终 审:董高怀

山西历史文化丛书(第21辑)

张穆与《蒙古游牧记》

郭丽萍 著

*

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

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0351-4922123

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

*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5.5 字数:300千字

2006年9月第1版 2006年9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:1-1000(套)

*

ISBN 7-900434-33-x

G·73 定价:(全套10册)30.00元

《山西历史文化丛书》编委会

顾 问：王 谦 李立功 赵雨亭 王庭栋 任继愈
姚奠中 申维辰 张 颌

主任委员：李玉明

委 员：（按姓氏笔画为序）

马玉山	马志超	于贵卿	于崇良	王克林
王志超	王宝库	王灵善	王振芳	王家壁
牛崇辉	田中仁	冯素梅	任茂棠	刘 巩
刘在文	刘纬毅	刘振华	刘晓丽	成葆德
齐荣晋	李元庆	李东福	李锐锋	吴广隆
宋丽莉	杨二怀	杨子荣	杨建峰	张国祥
张捷夫	张鸿仁	罗广德	陈长禄	胡存悌
赵曙光	郑建国	降大任	郭士星	郭双威
郭维明	高 可	高专诚	陶正刚	柴泽俊
秦海轩	梁俊明	谢 恺	董永刚	董占锁
董瑞山	楚 刃	雷忠勤	霍润德	

目 录

引 子	(1)
一、早年的求学生活	(1)
二、游学京师	(5)
三、结缘西北史地研究	(12)
四、失去科考资格	(16)
五、《元朝秘史》与《魏延昌地形志》	... (18)
六、经世有志 参政爱国	(21)
七、《藩部要略》的校刊	(26)
八、《蒙古游牧记》的问世	(28)
九、提携后人	(34)
十、宁静以致远	(37)
十一、病痛中校刊文献著作	(41)
十二、卒于京师	(44)
尾声	 (47)

引 子

张穆，初名瀛暹(xiān)，字石州，别署月斋，清代著名西北史地学家、诗人、书法家。身处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的转折年代，张穆的思想、学术承上启下、继往开来，他敏锐地洞悉到变局的来临，积极反思王朝盛衰之缘由，是道光朝讲求经世致用的代表人物。张穆的西北史地研究，既是对乾嘉舆地学与蒙元史地学的继承，又开同光年间蒙元史研究之滥觞，而《蒙古游牧记》正是张穆学术生涯的顶峰。

一、早年的求学生活

张穆于清朝嘉庆十年(1805)出生在山西省平定州的一个官宦之家。

张氏家族的发达始于张穆的祖父张佩芳。张佩芳天资聪颖，博记强闻，小时候是方圆知名的“神童”，后来进入省城的晋阳书院读书，因为写文章不趋于时好、不骛于速成很受老师的赏识。乾隆二十二年(1757)张佩芳考中进士，取得旧时科举的最高功名。此后他一直在文事极盛的安徽任职，在当地建立书院，拔擢人材，研经辨古，讲诵典籍。晚年致仕返回平定时，还随身带回了一万多卷藏书。从张佩芳开始，张氏家族树立起了重视读书的家风。

张穆的父亲张敦颐是张佩芳的第四个儿子，出生于合肥。蒙学之初的八九年间，一直随父亲诵读《孝经》、《尔雅》，了解训诂大义。十四岁应童子试时，已经能够默写出《十三经》的全文，令当时的主考官大为惊讶。年长之后，张敦颐曾受聘在太平书院教授学生，读书习文，同时，参加科举考试，终于在嘉庆十六年(1811)得中进士，进入翰林院任编修。

张氏一门之内，两朝进士，这在清代的山西并不多见。在父辈的影响之下，读书、应试、入仕自然成为张氏子弟的奋斗目标与人生理想。于是，生命起始于张家花园的张穆，笃定会以读书开启其真正意义的人生。

对于儿子们学业的重视，张敦颐较之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张穆兄弟四人都自幼读书，二哥张晋暹十三岁时就能引笔作文，而且文采斐然；三哥张丽暹读书敏悟，十岁时就能流畅准确地背诵《周官》全文。兄弟几人都写得一手好书法，张晋暹擅长行楷，张丽暹楷书出色。在这样的读书氛围中，张穆六岁入塾启蒙，以兄长们为榜样，诵书习字。成年后张穆的书法遒劲大气，为人称道，其功底可以追溯到蒙学时期。

以今天所存的史料记载与清代一般的蒙学模式来推断，张穆早年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教育，通过识文断句培养了基本的阅读能力，在对前代圣贤典籍的背诵中积累了必要的知识，他也练习书法，学作文章，这些都是在那个时代读书人必需具备的素质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汉学盛行的时代，张佩芳父子都喜好理学。张佩芳在安徽做官时，与当地的理学名家程瑶田等人

有交往，他在科试中所选拔的人材如程昌期等士子后来也是以研习理学著名。张佩芳本人读书也专精宋儒，他一直希望通过提倡理学、倡导读书来正人心、振风俗、靖地方，从而对地方州县政治有所帮助。张敦颐也很喜欢研读理学，他曾写过“闽洛文章理学全，群英辈出仰前贤”的诗句来表达自己学术志向。另外，清代科举考试的取士标准仍是以朱子之学为主，在张氏这样极重科举的家族中，研读理学之书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
张穆兄弟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成长起来，他们阅读着祖父留下的万卷书籍、接受着父辈学识的耳濡目染，渡过了一段幸福的求学生活。开始时一切都很顺利。不久，这种平静的生活被双亲亡故的不幸所打断。

嘉庆二十年(1815)，张穆的母亲刘氏患心脏病而死于北京。仅仅三年后，张敦颐前往福建、赴任主考官的途中，突发急病，不幸于浙江建德去世。所幸的是，这些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并没有中断张穆的学业，而这一切要得益于表舅莫晋。

莫晋，字锡三，别署宝斋，浙江会稽人。莫晋曾在科举考试中有过辉煌的成绩，乾隆六十年(1795)他中了进士，而且殿试成绩列一甲二名，即民间俗称的“榜眼”。嘉庆三年(1798)，莫晋出任山西学政，视学平定州时，发现一位学生见识不俗，文采飞扬，十分喜爱，就把他选拔到省城读书。这位学生在晋阳书院也很出色，他的作文在半年中“七冠其曹”，也就是七次拔得头筹，成为同学中公认的佼佼者。有一次，莫晋读完他的文章十分高兴，在文后写下“三晋多才”的

评语。

这位学子就是张敦颐。因为志趣相投，莫晋后来与张敦颐交往十分密切，二人渐渐地由师生而成为好友。转眼间，莫晋在山西的任届期满，他在卸任返回北京时，邀请张敦颐随他北上。从此，张敦颐居住在莫晋家，成为莫晋的幕友。后来，二人师生之谊、朋友之情之上，又增添了一层姻亲之缘，张敦颐的原配夫人刘氏去世后，莫晋将表妹许给张敦颐，这就是张穆的继母李氏。张敦颐去世后，莫晋将少年失怙的张穆兄弟接到家中，督促他们继续学业。

为了不辜负家族对后人的期望，张穆的继母李氏承当起了教导子女的责任。她照顾着张穆的衣食起居，更关心着他的学业进展。白天，张穆入私塾跟着老师念书，晚上回家他还要挑灯夜读。寂静的小屋里，昏暗的灯光下，张穆手执书卷时，李氏常常陪伴在他的身旁。

寓居莫晋家中的那段日子，正是少年张穆思想形成的时期，这个时候读什么样的书，接受什么样的观点，将会对他的一生产生深刻的影响。

莫晋与张敦颐一样，四十岁以后专意攻读理学，在各位理学大家中，他尤“以姚江为宗”。“姚江”是明代理学家王阳明，面对明代后期的社会危机，他提出用“良知”到“知善知恶”，把作为外在道德律令的“天理”化作人们内心深处的道德自觉，从而再造一个以“天理”为行为动机的社会道德氛围。莫晋为张穆兄弟聘请的老师是吴朴庵，吴朴庵“笃慕戴山”，“戴山”是明末大学者黄宗羲的业师刘宗周，刘宗周的学问与王阳明一脉相承，因而莫晋也喜欢读黄宗羲的著作，

他曾出资重刊了黄宗羲的《明儒学案》，并亲自撰写了序文。

在父辈老师的影响下，少年张穆的读书范围也集中于明清理学家王阳明、吕留良、刘宗周等人的著作，阅读之余，他抄录了《王阳明语录》、《吕语集粹》、《刘宗周语录》等。

张佩芳父子重视程朱理学，而莫晋、吴朴庵更讲求阳明心学，不过他们读书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即杂取理学各家，重视学以致用。张穆随同莫晋读书时，莫晋的官职是仓场侍郎，这是隶属户部的正二品官，主持全国漕粮积储与北运河运粮等等事务。所以，莫晋对于脱离现实生活的考据学并不感兴趣，横在他眼前、令他朝思夜虑的是漕运、河工、粮储等具体事务。面对这些现实问题，潜心书斋、怀抱古书虽不能骤然化解，但圣贤典籍中常隐藏着解决问题的要诀，莫晋就在王阳明的心学中读出了务实的一面，并把阳明心学中躬行实践的特点贯彻到政务处理之中。莫晋的务实精神给少年张穆留下了极深的印象。

家学、师教在年轻学子的身上打上了深深的印记，影响到张穆一生的为学与为人。

二、游学京师

道光初年，张穆的继母李氏生病去世。此后，张穆兄弟一直呆在山西老家，一边刻苦读书，一边参加地方考试。他们在这些最初级的科举考试中，崭露头角，表现出色。张晋暹曾在州试中被拔为第一，张穆在另一次考试中很受主考

官的赏识，他的文章还作为范文被收入《山右试牍》。道光八年（1828）科试中，张穆名列榜首，张丽暹位列第三，一时传为科场佳话。四年后，张穆取得了优贡生的身份。

依照清代科举制度，优贡生通过朝考，进入国子监学习，期满之后可以做官。不过，做官的起点很低，一般只能从地方教谕、训导做起，因而当时取得优贡身份的学子也常常不赴京报考，而是另行参加地方乡试，由乡试而会试、进而出仕为官的仕途之路要更通达顺畅。无论考虑张氏两代进士的家世，还是张穆豪放狷狂的个性，以朝考、入国子监、出任低品小官的升迁之路都不是理想的人生选择。

不过，张穆还是决意入京，道光十二年（1832）春节一过，他就打点行装，匆匆北上。

京师重地，才士之薮，尤其在逢考之年，全国士子会集于此，以图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。张穆也是一样，结果他考取了正白旗汉教习一职，从此留居北京。应考期间，他结识了不少志趣相投的学子，与何绍基、苗夔等人成为好朋友。

何绍基，字子贞，湖南道州人，对金石书法很有研究，平生喜欢结友，他曾以“平生友朋乐，妙集当时英”的诗句来记述友朋之乐。何绍基的交游广达与他的家世有关，他的父亲何凌汉，是嘉庆朝进士，曾出任过山东、浙江等地学政，后官至户部侍郎。清代学政视学地方，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主持考试，选拔人材。道光年间，经何绍基拔擢的学子很多，他们来往京师，总要去何宅拜访恩师，渐渐地与何绍基熟悉起来。日照人许翰，就是何凌汉视学山东时所拔的贡生，后来时断时续在何凌汉幕府中阅卷校文，成为何绍基的知交好友。

与何绍基相识几乎影响了张穆一生的交游。何绍基是张穆在京师文人中建立关系的基点,通过何绍基,张穆结识了入京后的第一批友人许瀚、王筠等人;何绍基还是一条主线,延伸贯穿直至张穆生命的终点,日后张穆的许多挚友如沈垚(yáo)、魏源等人都源自何绍基的导引与介绍。

张穆与何绍基近二十年的交谊中,借书闲话,饮酒赋诗,交流书法,讨论学问,不同时期,二人也有不同的谈论主题。在二人相识的最初几年中,他们商谈最多的是小学。

清人所说的“小学”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文字学,是研究经学典籍的基本方法之一。当时与他们交往的友人,有不少也很擅长小学,许瀚就是其中之一,他曾受学于清代著名考据家王念孙、王引之父子。研究文字学,又大致可以分为两类:研究一个字或一个词的意思,或是研究字与词的联缀用法,这就涉及到对《说文》等辞典的研究,清代人也常称为音韵学。苗夔(kuí)、王筠都是研究《说文》的好手。

与这些朋友一起读书、讨论的张穆在当时也以小学而有名,早期留意研习的考据方法为他未来治学打下了基础,也始终贯穿于他的治学生涯。

以优贡而朝考作为仕进之途并不理想,但以此为契机开拓的交游网却对于张穆的视野开阔、学识长进大有裨益。对于这一点,张穆可能在打点行装时就已心中有数,因为,此前他曾得到过祁雋藻的指点。

张穆老家平定州在清代还出现了另一个世宦大家,即寿阳祁氏。祁氏家族的显要始于祁韵士,这位乾隆四十三年(1778)的进士,曾任国史馆纂修官、户部宝泉局监督,后因

故发配伊犁。曾主持编纂《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》、《西陲总统事略》，还撰有《西陲要略》、《西域释地》、《万里行程记》等。祁韵士之子祁寓藻，为嘉庆年间进士，历事四朝，辅佐过道光、咸丰、同治三帝，官至首席军机大臣。祁氏与张氏同籍平定，均为当地有影响的大族，世有交往，且有姻亲关系，张穆的三嫂即是祁韵士的女儿。

张穆入京的前一年，即道光十一年（1831），曾拜访过因母亲生病请假在家的祁寓藻。祁寓藻比张穆大十二岁，从姻戚关系来说，二人是平辈。张穆这次在寿阳祁家老宅住了两个晚上，二人虽是初次见面，交谈还挺投机。张穆走后，祁寓藻写下“回头笑问张公子，本色豪端已如此”的诗句，张穆的侠义性情给祁寓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也正是这次会面，开启了张穆一生朋友交游、学术研究的另一主线，与何绍基一样，祁寓藻也对张穆影响至深。

经祁寓藻的介绍，张穆在京师时拜访了祁寓藻的岳父陈用光。陈用光是内阁学士，雅好文章，他的幕府中云集着不少著名的学者，当时，俞正燮正在为陈用光校订顾祖禹的《读史方輿纪要》。张穆在陈府结识了这位江南大儒，二人从此成为忘年交。张穆常常向俞正燮问学，所谓是“客邸一邂逅，过从辄频频”。比张穆年长三十岁的俞正燮很欣赏这位年轻人的天资与执着，不但为他解惑答疑，而且为他指点治学方法，告诫张穆“慧不难，慧而能虚，虚而能人为难”。这一教诲成为张穆终生不忘的座右铭。

能够有机会直面接受前辈学者的指教，对于初出茅庐的张穆是幸运的，更幸运的是他还有机会拜读这些学者的

著作手稿。俞正燮是位勤奋多产、命运不佳的学者，一生科场失意，为人做幕友。张穆初识俞正燮的时候，这位生活于贫穷动荡中的学者还没有刊印过一部著作。张穆、许瀚等人常常聚在一起阅读这位前辈的著作手稿，他们后来还帮助俞正燮从行篋藏稿中选编出一本十五卷的文集，因为编次于癸巳年而取名为《癸巳类稿》。

在俞正燮的身上，张穆体会到一位学者所应具备的知识与识见。俞正燮具有很深的考据学功底，但他的考据对象不仅在于经学，还扩展到史学、天算、水利、典章制度甚至边疆史地，他一直很留心《京报》的时事记载，在嘉庆年间还利用入叶继雯幕府、襄助校订《大清会典》的机会翻阅了官府所藏档案，对于清朝当代史事制度很有研究，曾撰写了《驻劄大臣原始》一文，叙述清代前期边疆民族关系中的各种重大事件，阐明清政府设置驻劄大臣的原委。从这些记载中，可以看到俞正燮关注现实的态度有别于当时一般的考据学家。他也很注意有关俄罗斯的记载，撰写了《俄罗斯佐领考》、《俄罗斯长编稿跋》等文章。俞正燮的治学方法、研究领域都对张穆的未来产生了影响。

在京城，张穆还拜见了祁雋藻入执南书房时的同事程恩泽。程恩泽也是京中文人交游的中心人物，他识人爱才在当时是闻名的，大有伯乐遗风。后人称赞他屈尊折节、礼贤下士时常提到他对张穆的赏识。程恩泽比张穆年长十四岁，官居户部侍郎，可每隔三五天，他就会邀请张穆到家中叙谈，二人常常在程恩泽的书房“视月斋”中饮酒茗茶间，谈论到深夜。

其实，程恩泽与张穆的交往背后，还有程、张两家三世交谊的深厚背景。

程恩泽的父亲程昌期幼时家贫，但读书聪颖，应童子试的时候，被时任安徽歙(xì)县县令的张佩芳所赏拔。为了让他继续学业，张佩芳把程昌期领入家中，教他读书，视同家族子弟。由于张佩芳的接济与教导，程昌期后来学业有成，中得进士，殿试时得中一甲三名，即俗称“探花”，官至山东学政。程昌期与张敦颐自幼同学，程昌期后来病故于山东学政任所时，乾隆皇帝派程昌期的安徽同乡曹振鏞前去料理后事，张敦颐曾随同前往，由此可见二人交情之深。清代应科举的学子，有早慧且幸运的少年，也有皓首而坎坷的长者，程恩泽与张敦颐本是两代人，年纪差距也不小，可二人同年中进士，同入翰林院，在清代他们就是同年、同学了。

张敦颐去世之后，程恩泽与张家后人失去了联系，张穆的到来，重续起两家几十年的交往史。因为程恩泽的提携与引见，当时出入程府的文人学者，如陈奂、徐宝善、徐松、龚自珍、梁章钜、郑复光等人也为张穆所认识。在与他们的交往中，张穆开始触摸到道光朝学风流转的脉搏。

清代学者治学多讲求专精，但程恩泽博综经史，对于天算、地志、六书、训诂、金石等也都很有研究。撰有《战国策地名考》二十卷，对于战国时期孟津、蒲反等地位置所在都有新见解；在研究算学后，他认识到清人治算学，从古代的九章算术疏通四元之学，虽说是发明绝学，但终是纸上功夫。当意识到古人精思巧造的仪器多已失传时，他曾与友人相约一同修复古仪器；他对传统天文学也有研究，还写过一篇

专论彗星的文章《释彗》。

与程恩泽等人的交往为张穆展示着更广阔的知识领域。

与程恩泽同籍安徽歙县的郑复光,对中国传统科技深有研究。张穆与郑复光认识后,曾跟从他学习算学。二人常围坐在火炉边,灶台上温着酒,膝头上摆着书,谈艺论道,十分惬意。有一天晚上,两人谈兴正浓,郑复光忽然起身,拿出自制的望远镜,带着张穆来到屋外。时已夜深,四处寂静无声,一轮明月挂在天际。郑复光把望远镜对准月亮,透过镜筒,张穆看到月亮中有黑点向四面散去,就像夏日池塘里的点点浮萍。这奇异的景象令张穆惊叹不已,他急忙询问其中的缘由,郑复光于是为他讲解了望远镜的基本原理。第二天,郑复光将自己有关望远镜原理的著作拿给张穆看,张穆觉得十分有趣,当即请人把全书抄录了下来,这就是后来张穆校订刊刻的《镜镜詀痴》。这些学者所研究的“实学”知识,令张穆眼界大开。

当时关注现实、讲求经世的新学风已在京中兴起,程恩泽也是这一学风的推助者,他虽然没有目睹道光中叶鸦片战后的世事动荡,但他对清代社会由盛到衰的现实已有清醒的认识。智者识大体,他也因此预见到未来学术大势。当人们称道张穆的小学功力时,程恩泽看中的是张穆文章中的经世色彩。他曾以“东京崔蔡之匹”称赞张穆的文章(这里“东京崔蔡”指东汉末年的文学家、政论家崔寔与蔡邕,二人为文多指评朝政阙失,关注百姓疾苦)。

也许,正是程恩泽的肯定与赞许,坚定了张穆著述的议

政风格；或者，正是由此而始的治学之门，渐渐把张穆引向“书无所不读”、“百家之学，无不洞其原委”的经世致用之路。

这样，以同学、同年、姻亲、世交等关系为线索，张穆在北京拥有了一个联系密切的交游网。在他的师友群中有见多识广的官宦、通人，有学识渊博的长者、硕儒，也有初入治学门槛的后生、新人。道光十五年（1835）冬天，张穆准备返回山西。与四年前孤身赴京时大为不同的是，他在京城中已有相当多的至交好友，临行时大家为他置酒饯行，吟诗送别，在程恩泽诗句“记衰时多误，群去谁予诤？解创私自喜，君去谁予证”中可以推知，张穆已经成为朋友圈中谈学论道不可或缺的人物。

三、结缘西北史地研究

“九载困乡井”的张穆，一旦走出学问的空谷，走入人才渊薮的京城，他的人生之路已不可逆转。老家阳泉山庄的幽静再也留不住这位学子赶赴异乡求学的脚步，张穆只在家乡小居半年。

道光十六年（1836）夏天，张穆又一次来到京城。不久，祁雋藻也从寿阳返回京中。此前几年中，祁雋藻常呆在山西，先是母亲病重，回家侍养，后来母亲去世，居家守丧。祁雋藻回京后，邀请张穆住在家中，以当时人的说法，张穆也就成了祁雋藻的幕友。

一般来讲，幕友的职责或是授书课子，或是校文阅卷、或是协助幕主处理政务。当时祁寓藻正筹划着刊印父亲祁韵士的著作。此时祁韵士已过世二十年了，他所主持的《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》因被收入四库收藏于南北七阁，《西陲总统事略》在嘉庆十六年(1811)曾有过刊本，其余著作均被束之高阁，藏在家中。在清代，后世子孙整理刊刻先人文集著作是较普遍的现象，何况祁寓藻已经是官阶正二品的兵部左侍郎，有条件延请整理文集的幕友，也有能力出资刊刻先人的遗作。

在祁寓藻幕府中，张穆开始了祁韵士西北史地著作的整理工作。

今天，我们在了解了历史人物完整的人生故事之后，才一笔一笔地勾勒着他的人生轨迹，我们清楚地知道，那些在无意间遇到的人、看似偶然的事，实际上正一步一步将张穆引向西北史地研究、引向《蒙古游牧记》。

清代的西北地区，居住着蒙古族、回族、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。清朝初年西北地区并没有完全内附朝廷，从康熙年间用兵西北，历经三朝之后，乾隆年间开始设官屯兵，将西北完全纳入清统治的版图，随之西北研究也兴起了。在接手校订祁韵士著作之前，张穆就接触过这一研究领域，他熟悉的俞正燮《癸巳类稿》中就收有《俄罗斯佐领考》、《俄罗斯长编稿跋》、《驻劄大臣原始》等文章。

不过，张穆对西北的了解也只刚刚起步，他迫切需要熟悉这一领域学者的指导与帮助。恰在这时他在何绍基家中结识了沈垚，沈垚还拿出了刚刚完成的新作《西游记金山以